

抗日联军为什么要撤退	在苏联北野营的五年	(1)
到了北野营	(东北抗日联军生活回忆中的一段)	(13)
吃饭依然有问题		(14)
日苏中立条约对我们的影响	(第二次稿)	(15)
小部队的派出		(17)
战争消息突然到来		(18)
空降训练		(19)
和我们的党中央未能取得联系		(21)
和苏联人一次重大的争吵		(24)
苏联代表王新林		(28)
伪满军一个连的起义和越境		(29)
国际路的成立		(30)
军事训练颇有成效		(34)
苏军中的内务部组织		(37)
共产国际宣布解散		(39)
来自延安的学习材料	彭 施 鲁	(40)
中国共产党组织在东北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	(40)

抗日联军为什么要撤退至苏联境内	(1)
到了北野营	(13)
吃饭依然有问题	(14)
日苏中立条约对我们的影响	(15)
小部队的派出	(17)
战争消息突然到来	(18)
空降训练	(19)
和我们的党中央未能取得联系	(21)
和苏联人一次重大的争吵	(24)
苏联代表王新林	(28)
伪满军一个连的起义和越境	(29)
国际旅的成立	(30)
军事训练颇有成效	(34)
苏军中的内务部组织	(37)
共产国际宣布解散	(39)
来自延安的学习材料	(40)
中国共产党组织在苏联的存在形式	(40)
东北的解放	(42)

在苏联北野营的五年

(东北抗日联军生活回忆中的一段)

北野营设在苏联境内，距哈巴罗夫斯克（伯力）约七十五公里，在黑龙江（苏联人称阿穆尔江）南岸靠近江边的一片森林中。由野营顺着江边向下游走上两公里，有一个苏联的集体农庄，名叫弗亚斯克，约有四五十户人家。因之苏联人把北野营称之为弗亚斯克野营。我们称之为北野营是因为在苏联的双城子附近还设有一个同样性质的野营，从地理位置上我们把那里称之为南野营。在一九四〇年冬季，东北抗日联军的大部分部队有组织地撤退到苏联境内，分别地集中在两个野营内。我刚到北野营时，那里只有两三栋不大的房子，尽管已是严冬腊月，我们大部分人还得住在帐篷里。里边装有大铁筒改制的烧木柴的炉子，倒也暖和。开始只有两名苏联军官在那里，一个是上尉，他起了个中国名字叫吴刚。一个是中尉，都叫他李吉南，原以为也是用的中国名字，以后才知道这是俄语中尉的意思，全称是李吉南特。俄语“李吉南特”的发音重音在“南”字，最后的“特”字音很轻，不懂俄语的人几乎听不出尾音的“特”，因之以为只是“李吉南”三个字。到一九四一年的一月，苏联任命了一个野营主任，他的中国名字叫杨林，大尉军衔。这几个苏联军官负责照管着我们的生活以及军事、政治学习。

抗日联军为什么要撤退至苏联境内

在一九四〇年的十二月前后，东北抗日联军的队伍绝大多数被迫越境进入了苏联。这实际上是个战略性的撤退，是迫不得已的一个有组织的统一行动。为什么我们不在东北坚持抗日而要撤退至苏联境内

呢？这要从一九三八年以后的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形势说起。

在一九三七年之前，东北抗日联军处于发展时期。“七七”事变后的全国抗战形势，对东北的抗日斗争产生了极为有利的影响。那年在松花江下游和牡丹江地区到处都可以看到红旗招展浩浩荡荡的抗日游击队伍。在许多大县城的十里之外都变成了游击区。如依兰、萝北、绥滨、勃利、富锦、宝清、集贤、汤原、桦川、刁岭、鹤立等地区，我们的队伍都可以按照自己的计划进行活动。日伪军是没有力量出来骚扰的。当地的伪军如三十团、三十五团和三十八团都是非常动摇的。伪军第二十九团曾在团长赫奎武的率领下全团起义（以后又投降日寇了）。遇有大批日伪军出来讨伐时，我们只不过在山里隐蔽三五日并转移个地方也就平安无事了。即使是冬季落雪后，也只是把深山里面的密营作为暂时休息的地方，大部分时间还可以活动在居民区里。但是就在这时，日本侵略者在三江地区策划着一个归屯并户政策，这个政策在此之前曾在东南满一带使用过，并曾使东北抗联第一军和第二军处于困难境地，尔后被迫从原游击区转移。一九三八年刚开始，侵略者的这一计划便付诸实施了。凡是游击队活动过的山沟里，居民一律被强迫搬下山来，到指定的人屯子里安家，强迫不走的就被杀掉，房子被烧掉，东西、粮食被抢光。那时真是村村冒烟、家家哭喊。没有过两三个月，我们的游击区变成了无人区，我们的存身之处成了问题，更重要的是粮食来源断绝了。在这同时，日本侵略者广泛开展了劝降活动，过去游击区里的伪保甲长和一些地主头面人物，这时不少人被日本人用来向游击队劝降。首先选择的目标是被我们收编的山林队头目。这一手很见效，他们在这种困境中对抗日的前途失掉了信心，有些就投降了。但是更多的山林队是自行解散各奔前程了。

在这种形势下，我们也不得不采取相应的措施，开展了一场反对投降主义的斗争。一当发现有的山林队的头头有投降的征候时，就果断地将他们解除武装并将头头杀掉。那时我还在第四军工作，任第四团政委，亲自参加了对山林队老来好队伍的缴械工作。这个队伍有一百多人，曾被收编为第十团。此外，还缴了一个有三十多人的小山林队，是属于自来好（李天柱）手下的一个连。与此同时，我们也遭受到一些不幸。派到第八军谢文东部队担任政治部主任的共产党员刘曙华同志被所在的部队杀害了，部队投降了日寇。第四军第二师师长王毓峰同志也被一支收编的土匪队给杀害了。这样之后，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形势就起了一个重大的变化。原来的队伍大大缩小了，所剩下的只有共产党自己所领导的队伍了。同时，原有的游击区不能继续活动了，因为日本侵略者已经把围剿抗日队伍的重点放在松花江下游了。敌人军事上的围剿配合着归屯并户的政策有成效地使我们处于较为困难的境地。

也正是在这个期间，由于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团离开莫斯科回到延安，因之抗日联军和党中央相联系的线索也中断了。在这样的处境下，唯一的希望是能够取得苏联的某些支援。东北抗联第三军军长赵尚志同志，根据北满省委的决定，带了少数几个人从萝北县越境去苏联，想得到一些武器和弹药上的援助。但是他的离开同时也给部队带来了不稳定因素。第六军军长戴洪滨和第三军的一个师长蔡近葵等，在萝北县同日伪军作战失利，伤亡较多，他们也就各自带着一部分队伍越境去苏联了。在这前后带队越境的，还有第十一军军长祁致中，第三军第四师的于保合和李铭顺等，有的是从虎林县退到苏联境内的。他们原以为苏联既然是工人阶级的祖国，那末从那里取得一

些援助再回来打日本是不会有问题的。但是实际上他们全部被苏联关在监狱接受审查，并没有得到苏联的任何援助。

在这种情况下，松花江下游的形势引起了急剧的变化。抗日联军必须重新部署自己的力量，必须迅速地脱离松花江下游地区，开辟新的活动区域。因之决定第三路军所属的三、六、九、十一军在李兆麟同志率领下转移至小兴安岭以西嫩江地区；而第二路军所属的四、五、八军则向吉林西部五常、榆树一带转移，以期能和第十军汪雅臣的部队汇合共同开辟新的游击区域。第七军则仍坚持在虎林饶河一带活动，因为那里是和苏联保持联系的主要通道。不过这些计划执行得都不顺利。第八军谢文东的部队在一九三八年全部投降了日寇。第四军和第五军的远征队伍在李延平军长和王光宇付军长的带领下由宝清县出发经集贤、桦川、依兰、方正、延寿县前进，一直处于前有敌人堵截，后有敌人尾追的不利态势，沿途战斗减员相当严重。第一师师长张相武同志在刚一路上征途时就在集贤县国强街基附近牺牲。五军第一师于西征时在关书范师长的带领下又中途返回刁岭地区。关书范在悲观失望的情绪下准备向日本人投降。经下级揭发后，被第二路军总指挥周保中同志判处他以死刑。随军同行的吉东省委书记宋一夫和第四军第二师政治部主任曲成山也逃跑了。这样，远征部队虽说到达了五常榆树境内，但并未和第十军汪雅臣的部队取得联系。实际上那时汪雅臣的部队也处于极端不利的境遇中。第四军军长李延平、付军长王光宇相继牺牲于一面坡地区，少数队伍被迫返回刁岭地区。一九三八年可以说是抗联队伍损失惨重的一年。

到了一九三九年的一月，我被调到抗联第七军工作。第七军是以虎林饶河为根据地的。在一九三八年当中他们也遭受了一些损失，但

还算是基本上保存了自己的力量。冬季利用山里贮存的粮食勉强地渡过了。在一九三九年初的春节后，日伪军进到山里组织了一次进攻，但因兵力不大，未使第七军遭受到重大的伤亡就被打退了。到了四月，冰雪已开始融化。根据军部的决定，队伍要改变活动方式，要到新的地区开辟游击活动。那时我已是第七军第一师的政治部主任。师长是王汝起，付师长是刘雁来。在出发前，我们研究了形势，由于征粮工作不如过去那样容易解决，因之队伍宜于分散，勤转移。还得选择个秘密地方种些玉米、土豆和萝卜等。还安排了两个人在山边的河里档鱼亮子捕鱼，晒鱼干。这些都要作为冬季的储备食品。至于游击活动地区我们选择在同江富锦、宝清和抚远几个县之间的沼泽地带。这次活动不象过去可以在一片村庄里住上几天，现在必需远离村庄。为了征收粮食只能利用夜间突然进入村庄，而在完成征粮任务之后不等天亮就得迅速离开。遇到有的村庄设有自卫团时就得边打仗边征粮。只要在天亮之前离开村庄我们就是安全的。那一片沼泽地纵横几百里，其中又有不少断断续续的干燥的树林子，便于隐蔽，可作良好的宿营地。因为在每个树林的周围都有沼泽地，敌人想在此接近我们是很难的。那时我们的队伍也比较精干，一个团不到一百人，目标较小，征粮数量也不大，因之敌人不太容易发现我们。事实上在一九三九年和一九四〇年两年内的夏秋两个季节，日伪军没有进到这一片沼泽地和我们较量过。我们在这里可以养精蓄锐，休息好了就组织一次出击。一九三九年我们向抚远县出击过，在六、七、八的三个月时间内，我们占领过乌苏里江边的蒿通镇和果夫镇，袭击过江边的抓吉镇，消灭了那里的警察队三十余人，缴获了全部枪支，还打死了两个日本侵略者。在这次战斗之后，日本人派了一个连追踪我们，这个连在杨木林

子村宿营时，遭到我们的夜袭，被打死了三十多人，给我们丢下了三十多条枪，其余的都狼狈地跑回去了。在一九四〇年的一年里，我们截获过乌苏里江的运输船，夺取了上百袋面粉，袭击过富锦县的柳大林子警察队。那一次因为敌人死守在院墙里，依靠院墙四个角的炮台顽强抵抗，我们没有能够消灭他们，仅只是完成征粮任务之后于拂晓时撤回沼泽地。那年九月，我们又到达了宝清地区，和伪军三十团机关枪连的几个爱国分子取得联系，策应了他们的起义。这次行动是非常成功的。他们打死了几名日本军官和连长，号召全连起义。这个头目就是一个班长杨清海。由于同时有抗日联军第七军（已改为第二路军第二支队）的二百多人包围了他们的兵营，伪军中不知情者被吓得魂不附体，只好胡里胡涂地跟着起义。但是杨清海对其中大多数人并不相信，在和我们商量之后，决定把他们所背的枪支的枪栓全部卸下来，集中装在一个麻袋里，用车拉着走，只给他们每个背一个枪筒。那次共带出三挺重机关枪，两挺轻机关枪，八十来条三八式步枪。这次对日本人来说震动是不小的。除了派地面部队追击我们外，还有三架飞机追踪着我们。我们和起义者的队伍在天亮时已经进入了沼泽地。但在九点多钟就有三架飞机一个接着一个地来了。我们的队伍是个一字长蛇阵，而且人与人之间的距离都有十来步远，当一看见飞机就都停下卧倒在行军路线的两旁草丛中。飞机打了枪，投了弹，但是我们没有什么伤亡，只是炸伤了一匹马。起义者队伍中有的却害怕了，假装着走不动路，掉在后面，不想跟我们走了。我们就把他们背的枪收过来放在车上继续走。至于他还要不要走，只好听便了。用这种形式逃跑的不下三十人。不过我们终于摆脱了敌人的追击，到了中午我们已经安全地在几个小树林子里安营扎寨了。清点胜利品，用面粉

做疙瘩汤吃，也算改善了一次生活。

在此之后，我们又趁尚未落雪之前，花了三天时间，突然进入密山县境。经过一个白天的侦察之后，在半夜袭击了日本人在那里的移民团。进入村子之后，才知道这些人实际上只有少数自卫用的枪支。在枪响之后，他们纷纷逃窜，少数人被我们打死了。我们没收了大批粮食和牛马，决定返回饶河过冬。

说起一九三八年的冬季，虽然也是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渡过的，但是每天有时还能每人分四五两小米熬粥喝，有时可以用豆饼当饭吃。一九三九年的冬季就比这困难了，不象三八年那样还可以住在自己的密营里。日伪军利用冬季深雪的有利条件，分成若干路讨伐队在山里搜索，遇到我们的脚印就跟踪前进，遇到我们住的房子或临时搭的窝棚就烧，他们还利用叛徒来搜寻我们的粮食仓库和菜窖。我们随身携带的粮食只不过能吃四五天，吃完之后想再取得粮食就非常的困难。大山里的深雪给我们造成的困难是极大的，行军艰难，一小时难以走出四五里路，我们的去向难以保密，行军的踪迹很快会被日伪军发现，夜间要打火堆，大家围着火堆睡觉，在零下三四十度的气温下，是难以持久的，除了冻伤之外，在敌人的持续追踪下伤亡数量很大。总的说来，在一九三八年之后，冬季给东北抗日联军的游击活动所带来的困难是致命性的。

回顾一下从三八年春到四〇年冬的三年抗日游击战争的形势，我们虽然采取了许多措施想要扭转不利的态势，但是并未取得成效。队伍得不到兵员补充而且伤亡又是逐步增加的。抗联曾设法自己种地争取冬季粮食自给。如果能成功地做到这一点，那末冬季就可以完全隐藏在深山里不暴露自己。但是我们种的地都被日本人的空中侦察发现

了，而随之就派部队去捣毁青苗。我们队伍中出现的变节者有时也变成了日伪军的向导帮助敌人寻找我们的粮食和菜窖。冬季绝粮的问题我们未能找到解决的办法。这就不能不迫使我们彻底检讨一下自己的工作 and 重新确定今后的斗争方针。

日本侵略者自一九三八年初所实行的归屯并户政策，终于成功地把抗日游击队伍和人民群众隔离开来。虽说是我们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依然坚持了三个年头的抗日游击活动，但损失是惨重的。这就说明离开了人民群众这个最根本的条件，抗日战争是有可能发展并壮大起来的。而所谓的人民群众又必须是农村中的贫农和雇农阶级，而不是包括地主阶级在内的整个农村。由于我们和党中央的关系处于隔绝状态，因之中央的行之有效的发动贫雇农的农村工作政策我们是无法得到的。我们对于农村中的阶级路线始终是模糊不清的。我们也有自己的根据地，但是这个根据地的含义只不过是深山里的秘密营地，是不包括农民群众这个条件在内的。没有农村政权的根据地是无法长期坚持下去的。

还有一件特别值得一提的事实是，一九三九年的夏季，在苏联被关押了一年半之久的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军长赵尚志，第六军军长戴洪滨，第十一军军长祁致中等人恢复了自由，苏联人允许他们重返东北。但是原来跟他们越境的干部和战士很多人都不知去向了。有的被送往新疆，原第三军师长蔡近葵就是其中之一。有的被苏联派回东北搞情报工作。苏联人只将能够组织起来的一百二十人交给了赵尚志带回东北打游击。由赵尚志任司令员、戴洪滨任参谋长、祁致中任付官长。他们一进入东北境内战斗意志非常旺盛，第一仗打乌拉嘎金矿，消灭了金矿守卫队，吸收了大批工人参军，队伍发展到二百多人。

在总结这场战斗时，赵尚志认为祁致中有抗违军令的行为而且私下散布过对赵尚志的不满言论，将祁致中处死了。这个做法曾引起了严重的后果。紧跟着所打的第二仗是由戴洪滨率领的一百多人去攻打汤旺河七号桥老白毛子的守卫队，在激战中死伤惨重，戴洪滨只带回了二十多人。他害怕赵尚志追究罪责，不敢回去，就自己直接找抗联第三路军总指挥李兆麟去了。与此同时，赵尚志还派了队长刘凤阳带几十人去打兴山，战斗也失利了，队伍跑散了一部分，刘凤阳又带着所剩的少数人越境了。这样不到半年时间，赵尚志身边只剩下二十多人。他想和李兆麟取得联系，但李兆麟避而不见。有一次第六军第二师师长陈绍滨所带的队伍和他们相遇。赵尚志派人去联系，但发现陈绍滨对他们有明显的敌视行动。双方都迅速地脱离了接触。在这种情况下赵尚志已无力继续开展自己的游击活动计划，在一九三九年冬季落雪之后，重新越境进入苏联。他们的失败也使苏联人对抗日联军的支持丧失了信心。

面对着这个严峻的事实，抗日联军不得不把保存自己的有生力量免遭日本侵略者的全部歼灭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在这个革命低潮的形势下战略性的撤退是完全必要的。因此，在一九四〇年里由东北抗日联军的领导者周保中、李兆麟、冯仲云、崔石泉等和苏联代表的会谈中达成了一项协议，允许游击队伍在冬季里撤退至苏联境内休整。这个决定是极为保密的，广大的干部是不知道的，只有支队长和政委才知道这个精神。

说到这里，我必须接着叙述我们第七军（后改称第二支队）从密山县重返饶河后的情况。一九四〇年冬季，在松花江下游的抗日队伍，饶河地区已成为主要目标了。由于我们在富锦和密山各

打了一仗，又有宝清县伪军一个机枪连的起义，因之日伪军一直追踪着我们这支队伍。十一月里，山里的积雪逐渐加深，我们的行动所遇到的不利因素日益增加。深雪里所留下的足迹成了追踪者最好的向导。不过由密山返回时我们还有较为充足的粮食，还是颇有信心地和敌人周旋。为了对付敌人的跟踪，我们几次用埋设手榴弹的办法多次造成日伪军的伤亡。不到一个月，粮食要吃光了，我们的子弹和手榴弹也所剩无几了。而敌人并没有收兵的迹象。日伪军采用了长期围困的办法，每一股兵力都不太大，但无数的小股的分布使我们经常和他们遭遇。到十二月份，很多地方雪深超过三尺，我们常常要利用夜间艰难地前进。每当坐在雪地休息之后，总有几个同志由于饥饿原因很难站得起来，还得由别人搀扶着走。这就使队伍的行动更缓慢了。我们的行进目的地常常是向着分散在几个地方的粮食库，但粮库又被日伪军捣毁了。连萝卜菜窖也被挖开了。他们不值得将萝卜带走，就用刺刀将萝卜砍得乱七八糟之后走掉了。但这些东西还是维持了我们几天的生命。每个人都背着十几个冻萝卜，到吃饭时由司务长下命令每人可煮一个萝卜吃。因为没有米了，司务长也不用大铁桶煮饭了。每个人用自己背的饭盒可煮自己的一份萝卜吃。有的战士发现了一堆蘑菇，那是最幸运的事了。再就是榆树皮也有人尝试过，用里边的一层嫩皮切成小块长时间用水煮之后会变成米汤一样的东西，喝了之后是可以充饥的。但太费事，在敌人的追赶下也没有可能每天搞榆树皮吃。有人说吃猪蜡可以止饿，那只是一时地减轻了饥饿的感觉。谁也没有试验过，因为那时也找不到猪蜡。的确，当时我们每天的话题就是如何减轻饥饿的感觉。那时还有个共同的体会，在断粮之后头两天有点饥饿难忍，但到第三天反倒不感觉饿了。这是为什么呢？以后才听到有

人从生理学上做出的解释：在两天之内吃不到粮的时候，肚子里缺少转化为热量的原料，人们会感到难以忍受。但生理的现象往往是过一段时间之后体内原来所积累的脂肪质开始燃烧，转化为热能，随之人的饥饿感就会减轻。但不管怎么样，浑身仍然是没有气力的。当时我们的斗争任务无非是两条：一是尽一切可能找到粮食吃；二是要避开日伪军的搜索。如果有了能够吃四五个月的粮食的话，那我们完全可以在深山里隐蔽到第二年春天，只要不暴露目标，敌人的搜索也难以收到任何效果。当时的问题是我们非得到处找粮食不可，就难以隐蔽自己，这就不容易避开敌人的搜索。而每次和敌人的接触都要给自己带来几个人伤亡的代价。

有一个夜晚，支队长王效明同志派大队长崔勇进同志带了廿多人出去寻找粮食。我们为了等他们回来，在一块隐蔽的地方打起火堆睡觉。天已拂晓，他们还没有回来。突然站岗的鸣了一枪，边往回跑边喊到：“敌人摸上来了！”大家急忙从火堆旁爬起，操起枪，背起背兜，这时敌人已经在四五十米处出现了。我们忙乱地向敌人打了几枪就开始撤退，这时敌人才响起了激烈的枪声。我们利用稠密的树林才得以摆脱了敌人。翻过一个山之后，队伍慢慢地又集结起来，清点人数，有十来个同志没有撤退回来，有五六个同志负了伤，支队长王效明同志的右手食指被子弹打断了。稍事休息，对伤者进行了包扎，就又转移了。崔勇进同志带的人还没有回来，还得去事先规定好的集合地点等着他们。直到中午他们才到了集合地点，他们什么粮食也没有带回来。大家沉默地互相看着，都希望着别人能出人意外地拿出一个什么样的好主张，或者是他想起了在什么地方还保存有几袋粮食。但是谁也没有说出什么来。

黄昏时，王效明把几个大队干部找在一起，和大家商量着说：“我们断粮已经是第七天了，而且看来日伪军摆出了对我们长期围困的态势，企图将我们赶尽杀绝。我们有必要将这支久经锻炼的队伍保存下来，以便有可能在有利的形势到来时把抗日战争的任务继续去完成。我们现在只有争取国际援助这唯一可选择的道路了。根据周保中同志的预先指示，我认为今天夜晚应该全部撤退至苏联境内。”与会者对他的这段话没有表现出热烈的称赞，也没有反对者。只有一两个人慢吞吞地说：事到如今，只好如此。……于是，队伍向着乌苏里江前进了。到第二天早四点钟左右，到达了江岸，对面就是苏联的比金镇。我们一百多人踏着江上的冰雪，响声非常之大。我们还选择了一个稍懂俄语的同志走在前面准备答话。突然岸上发出了喊声，跟着还有一发清脆的枪声。队伍停下来了，前面的人高喊：“巴尔吉赞！”俄语这个词的意思是游击队，通常我们只用这个词来说明我们是抗日游击队，而苏联边防哨所也完全懂得它的意思。这时苏联人派了一个班的人过来了，并且示意要所有的人把枪放在地上。我们都照办了，他们来回地检查了几遍，确信我们的身上已经没有佩带武器时才叫我们向前走，并由他们带着上岸，把我们安置在一个大房间里休息。我们在这里整整呆了一天，苏军送来面包给我们，还有土豆子和牛肉等，叫我们自己做饭吃，同时还嘱咐不得随便在院子里走来走去。以免被日本人的瞭望哨发现。支队长王效明被他们叫去询问情况，在边界城镇比金住的一个苏军上尉来此和王效明谈了好久时间才走。这个上尉是负责与东北抗日游击队取联系的联络军官，取个中国名字叫海陆。第二天早饭后，来了两辆大卡车，卡车用蓬布盖得严严实实，一来是为了卸寒，二来是为了保密。我们上车以后，苏军战士还专门把蓬布扣好。经过

了三四个钟头颠簸得很厉害的运行，中午到了伯力城内的一个地方，我们被引进一个大房间里休息喝水。这里看见了较多的苏联军官。他们出出进进，问问这个，问问那个。有的会一些中国话，什么“冷不冷？”“你叫什么名字？”等等，使我们增加了一些亲切感。过了一会儿，给我们送来了午饭：面包、咸鱼、白开水。面包很快被吃完了，他们只好又拿些来，每人又分了一块。不料吃完之后，很多人还是觉得没有吃饱。我们自己在商量怎么办好，应该不应该再请他们拿些面包来。因为大家经受了长时间的饥饿，肚子里已经没有任何积累了，现在还吃不饱饭的确是难以忍受的。因之只好厚着脸皮向苏联军官提出要求再拿些面包来。这个军官是个大高个子，长着个鹰钩鼻子。他听到这个要求后表示有些吃惊，耸了耸肩膀，尔后对另外一个军官说了几句话。等那个军官走出去之后，他又微笑着对我们说：“黑列巴耶西！”就是“有面包”。果然不过一会就又拿来一堆面包，这次才算满足了大家的肚子。看起来，我们是一个人吃了他们三个人的定量，难怪他们吃惊了。

到 了 北 野 营

吃完饭之后，他们安排我们全部的人洗了个澡，衣服也从里到外全部换掉了。我们的衬衣都是长满了虱子的，外面的棉衣都是破烂不堪，特别是棉裤膝盖部分，都在游击活动中被树条子挂得开了花，不少人的裤裆也都被挂破了，确实是衣不蔽体，实在有点不堪入目。大家换上了苏军的旧棉衣和旧毛裤，都显得精神多了。那天晚饭后，我们又被卡车运走了，大约走了两个钟头，来到了一片树林里。下车之后，很惊喜地发现在迎接我们的人当中，不少是相识的老战友，有五军的、六军的、三军的。相见之下，一片欢腾，话怎么也说不完了。

在我们之前已经有一百多人先到达了。这就是北野营。我们被引进到房子里，那里悬挂着煤油灯，双层铺挤得满满的。炉子是暖墙式的，俄国人把它叫别里达。因为就在树林子里，别里达总是用木材烧得旺旺的，屋里非常暖和。因为房子不够住，有些人就住在帐篷里。苏联军官吴刚和李吉南两人也走来走去，有两个抗联战士充当他们的翻译，其实他们也只是会说些吃饭睡觉之类的话。最初几天，在抗联战士中负责管理司务的是由第六军来的陈雷同志。没过多久，他又被派回东北执行任务去了。

我们在这里开始休整，人陆陆续续地增加。每天安排点学习，有政治课、队列教练、步枪射击、单兵和班的战术、刺杀、还有滑雪。政治课由我和陈雷、鲍林几个人讲，由苏联人指定内容，是从联共党史中选的一些章节，还有苏联一九三六年的宪法等。射击、刺杀、队列教练是由吴刚先训练出几个小教员，以后再由他们分头教给大家。

吃饭依然有问题

在这里吃饭是按定量分配，每天每人一公斤面包，菜食是以汤菜为主。按说，一公斤定量是相当高的。但那时除了女同志可以吃得饱以外，男同志没有一个说自己够吃的。开始是按三顿饭分面包，有人老觉得顿顿吃不饱有意见。因此就将一公斤面包在头一天晚饭前一次发给，由自己分成三份计划着吃。有些人就吃予支粮。有一个叫孔昭礼的战士，他每天晚饭时将所领的一公斤面包全部吃光，第二天的早饭和中午就只吃菜汤和只有一两米的一勺菜粥。时间长了，多数人觉得我们不应该再这样忍受饥饿，酝酿着要和苏联人交涉一次增加面包供应问题。终于推选了姜新泰、乔树贵和我三个人和苏联人谈判。那时野营又来了一位苏联军官，是个大尉，中国名字叫杨林，以后才知

道他的苏联姓是沙马尔钦科，苏联人任命他为野营主任。一个专职的翻译是个苏籍华人，苏联人只简单呼他为别佳，中国人也跟着喊他别佳而自始至终不知道他的中国姓名，也猜不透他的来历。他对我们这些抗日游击战士们很缺乏热情，他担任翻译时语气也跟苏联人一样盛气凌人。为了增加面包供应问题，杨林带着别佳接见了我们三个代表，谈了半天，毫无结果。杨林对我们谈了半天热量计算问题，说一公斤面包有多少个卡路里的热量，对于人身的需要量是足够的了。我们不懂这些，只懂饱不饱的问题。杨林说话的口气也是无可指责的，但总感到别佳对游击队有些轻视的态度，心里很不舒服。

日苏中立条约对我们的影响

在这个期间，周保中、李兆麟、冯仲云、崔石泉、金日成、王效明、季青、安吉等人还住在伯力，他们曾集中讨论了东北抗日游击运动的经验教训和今后如何将抗日斗争坚持下去的问题。他们每隔十天或半个月就到野营来看大家一次，有时讲讲自己的经验教训，有时讲讲关内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斗争形势。他们在伯力住着，可以收听广播，可以得到迟到的延安新华日报。皖南事变后，周保中专门给大家讲了一次事变发生的经过和对国民党这次阴谋的谴责。与此同时，周保中号召大家经过休整之后准备重新返回东北坚持游击战争。

一九四一年的三月，我们已接到通知准备分批回东北去。编组工作已做好。到了四月初，第一批的一百多人即将去伯力，在那里改换服装和领取武器。女同志被告知一律留下，留待下一步再回去。一个朝鲜族女同志全顺姬哭着送别了自己的丈夫金忠烈。第一批同志离开野营之后，当天晚上大家很晚才睡觉，经过三四个月的休整，都觉得精神焕发，认为回东北之后在春夏秋三个季节里大干一场是很有把握